本版编辑：曹颖新
E-mail：m6@studytimes.cn
Tel：010—62806236

人物志

勤政务实话蔡襄

□ 晏建怀

在后人眼里，蔡襄是以书法家著称于世的。其实，在当时，他还是一位勤政务实、关注民生的地方官。

蔡襄（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仙游人（今福建仙游）。十九岁即以开封府乡试第一的突出表现考取进士，名动京师。进仕后，他历任西京留守推官、知谏院、知制诰、翰林学士、三司使、知福州、知泉州、知杭州等职。庆历五年（1045年），知制诰蔡襄以母亲年老体衰需要就近照顾为由，请求皇帝宋仁宗让他到家乡福州任职。宋仁宗为他孝心所感动，安排他以右正言、直史馆出任福州知州。蔡襄到任伊始，便开始察访社情民情，当他了解到当地由于水利设施尤其是“古五塘”年久失修，导致旱情年年困扰、粮食年年歉收之后，决定对症下药，兴修水利。“古五塘”处于原东湖位置，东湖是晋代严高任太守时所修，大致位于今福州东湖宾馆、温泉公园、琴亭湖一带，后来疏于清理，淤塞严重，一部分高抬成田地，一部分分隔成接近水库大小的池塘，“古五塘”或许就是这些面积较大的池塘。总之，蔡襄说干就干，他积极筹措资金，动员群众投工投劳，清理淤泥，疏通渠道，在较短的时间内，恢复了“古五塘”，使大面积农田受益，水旱无忧。

皇祐六年（1054年），蔡襄以龙图阁直学士权知开封府。开封是首都，皇族、权门、巨贾、恶少，鱼龙混杂，极难治理。然而，蔡襄却不甘墨守成规，他到任后，大刀阔斧，惩奸治污，而且他善于抓大放小，行事干练，以简驭繁，决断如流。据晁说之《晁氏客语》记载：蔡襄任开封知府期间，“事日不下数千，每有日限，事拣三两件记之。至其日，问人不测如神”。一次，某富商被杀，家属到开封府报案，蔡襄要求捕快三个月内破案。后来期限已到，案件却无丝毫进展，为逃避责罚，捕快竟然随便抓了个流浪汉，弄些血衣、匕首做假证据交差。蔡襄审案之时，流浪汉大声喊冤。蔡襄觉得事有蹊跷，就问捕快：“凶手是在哪儿抓到的？”捕快回答说，是在城东关帝庙。蔡襄心中明白了捕快的“把戏”，先将流浪汉当堂释放，之后把捕快关进了大牢。他说：“这个流浪汉既不疯又不傻，倘若真是他杀，他销毁证据还来不及，怎会把那么明显的杀人证据留在身边、并在游人如织的关帝庙让捕快抓到呢？这不过是捕快为了结案，故意陷害好人罢了。”后来，宋仁宗听说这件事后，不禁连声夸奖蔡襄说：“君谟精吏事，京府无冤狱！”

嘉祐元年（1056年），蔡襄再任福州知州。在此任期内，蔡襄大力兴办学校，以教育推动人才的培养，以教育促进民风的转变，实现了教育与民风的双轮驱动。福州教育资源匮乏，他多方努力，广设乡校，普及教育。他礼贤下士，加强师资，聘请郡士周希孟、郑穆等博学鸿儒为州教授，不断提高教学水平。他提倡“文章与礼法并重”，双管齐下，使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学风更加浓厚。当时，福州民间沿袭一种陋习，谁家治丧，除在家大摆筵席外，还要在山头举办斋筵，任路人随意饮食，大吃大喝，铺张浪费。许多穷人家本就穷得叮当响，但民风如此，欲罢不能，逼得他们典田卖地，因丧致贫者比比皆是。为此，蔡襄亲作《戒山头斋筵》一文，提倡丧事简办，禁止丧家在山头设斋筵，违者严惩不贷，这股不正之风才被刹住。在蔡襄的治理下，福州百姓知礼守法，社会风气焕然一新。

蔡襄还曾两度出任泉州知州，直到嘉祐五年离任，前后共计四年余。他在泉州主要有两大政绩，一是修桥，二是植树。古万安渡，位于泉州城北二十公里处的惠安洛阳。洛阳江与泉州湾在此汇流，当时，南北两岸无桥可通，交通十分不便。由于水势险恶，过往舟楫常常不得不停渡。泉州作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商业十分发达，但水上交通不便却阻碍了商业发展，商人为此抱怨连天。为此，一些仕宦缙绅，很早就想捐资修桥，只是苦于政府无人引导而作罢。蔡襄到任后，立即牵头组织修建万安桥（又称洛阳桥）。他牵头拿方案，动员泉州各界人士捐资，自己也在并不富裕的情况下“捐一百六十石助役”。在他和泉州各界人士的努力下，全长一点二公里的万安桥终于在嘉祐四年底完工，造福了两岸百姓，使泉州的商业更加繁荣。万安桥是我国第一座海港大石桥，是我国建桥历史上的奇迹，被茅以升称作“福建桥梁的状元”。难能可贵的是，万安桥如此浩大的工程，却未动用国库一分钱。

在福州、泉州那段时期，蔡襄还动员和组织百姓，从福州至泉州、漳州，沿途遍植松树，全长达三百五十公里，防止了水土流失，保护了道路，成为当时最具影响的绿化工程。

史学漫谈

历史文本的可信性

□ 王兆贵

在所有描述女子仪态的诗文中，最传神的莫过于“临去秋波那一转”了。王实甫的这一千古妙喻，比陆龟蒙的“回头总是情”含蓄，也比白居易的“回眸一笑百媚生”耐人寻味。这不仅因为“临去秋波”传达出的眼神富于魅力，更因为“那一转”中隐含着无穷意味：可以是脉脉含情，也可以是幽幽衔怨；可以是恋恋不舍，也可以是殷殷期盼。总之，留给人的是无限遐思和猜想。

历史上那些未解之谜，多半也是这种情形。已经成为过去时的历史，特别是古代史，没有目击者来为我们还原，只能靠或多或少、或详或略的记载来解读。即便有目击者口述的历史，也会受到一定限制：一是目击者的视野，二是目击者的见识。在法庭上，为什么不同的证人对同一事件会做出同中有异的描述，道理也在于此。刑侦人员在对摄像头记录的影像做案情分析时，判断也会有偏差，意见也会有分歧。只有人证、物证、书证和影像记录相互参照，才能做出接近真实的研判。考古发现和研究的每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会对文字记载的历史做出佐证和补充，而且会对其中的出入做出修正和勘误。

历史应该怎么看，是许多年来一直争论不休的问题。争论的焦点在于历史的客观真实性及其可信度。我们知道，历史的真相只有一个，但描述历史事件的人却不止一个，回顾并还原历史事件的人就更多了。有秉笔直书的董狐笔法，也有讳莫如深的春秋笔法。这样一来，同一历史事件就会出现多个记叙版本。面对天上的火烧云，有人看了说像狗，有人看了说像猫，当然也有人看了说像狮子、老虎。有图有真相不错，但因旁观者受自我印象和感觉所左右，描述出来就另是一番情形了。

美国历史学教授柯文在《历史三调》中，以义和团运动为例，对历史是什么、应该怎么看等相关问题，进行过综合探讨，指出义和团的传述来自以下三个途径：一是史学家笔下的义和团运动，以叙事为主；二是直接参与义和团运动的中外各类人物当时的想法、感受和行为，他们对正在发生之事的看法与后来重塑历史的史学家的看法大为不同；三是在20世纪初中国产生的关于义和团的种种神话。作者认为，就上述三条认识历史的不同途径而言，后两条途径对普通读者具有更大的说服力和影响力。这也说明，在历史事件的解读上，官方和民间是有差异的，前者看重政治因素，后者偏于文化传统。

明代史家王世贞，著有《史乘考误》十一卷，在澄清史实和补充史实方面卓有建树，向为史学界所称道。他在该书引言中，曾对国史、野史、家史做过一番宏观比较，概括出这三类文献的弊端与可取之处：“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王世贞认为，人们只有弄清楚每类史籍的优劣，并加以综合分析，才能弄清历史的真相。为此，他对国史中关于傅友德、王弼、冯胜诸臣“暴卒”的记载，作了详细考证，指出这些所谓“暴卒”的人，其实是被朱元璋赐死的。这样的例子，在王世贞的史学著述中还有很多。

尔雅通识课在《西方文化名著导读》的期末考试中，曾出过这样一道单选题：对历史文本说法正确的是哪一项？试卷给出了四个可选答案：A、历史文本可以是纯粹客观的；B、历史文本对同一事件的不同历史细节的选取可能会表达出十分不同的观点；C、通过历史文本历史学家可以完全重构历史；D、历史文本可以完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逐一分析起来，答案A在“客观”之前冠以副词“纯粹”，答案C在“重构历史”前冠以副词“完全”，答案D在“避免主观因素的影响”前也冠以副词“完全”，显然都是不可能的。排除过后，正确答案只能是B。

那些写历史的人，尽管并非存心粉饰历史，但在力求客观的同时，也难免会有所选择和取舍，难免会掺杂个人见识。有鉴于此，我们在读史过程中，既不要被“临去秋波”所蒙蔽，只见妩媚，不识幽怨，陷入片面性和理想主义，也不要被“那一转”所迷惑，一片混沌，无从辨析，陷入不可知论和虚无主义。

从“负翁”到富翁

□ 王学滨

笔者在一所高校任教，亲身见证了一位曾经交不起学费的同学，一步步转变为两家企业的创立者。作为他的老师，尤其是自己在其中发挥了些许作用，是非常开心的。

初次相识，是因为这位同学想要建立创业协会，想要找指导老师。在普通院校中，能够碰到一位有想法的同学，是挺不容易的事情。因此，虽然事情很多，但经过沟通，我还是答应了下来。我们事先约定：作为指导老师，我负责提供建议和机会，具体的事情需要协会的同学自己去做。

初识这位学生，感觉他是一个很有想法又肯坚持的学生。他想做的第一件事情，是想建立一家公司，帮助在校生做兼职。在这件事情上，我对他的要求是不能先收同学的钱，但可以从与校外企业合作开始。正好有公司需要暑期兼职人员，我就带他去商谈，告诉他如何着装，怎样与单位沟通。结果是，他给那家公司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但这些兼职机会，他的同学不愿意做，第一次尝试以失败告终。

之后，随着与他接触增多，我发现他的人缘很好，总有几个同学愿意与他一起工作，完成任务。同时还发现，他感兴趣的事情是对儿童进行国学方面的教育。

寒假的一次兼职，让他跑遍了北方的很多省份，对他而言，更大的收获，是发现了市场调查是个不错的快速创业项目。毕业后，他创建的第一个公司就是从事市场调查方面的业务。

很快，他发现这类公司的发展前景有限，就开始寻找其他项目。他的兴趣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当时《爸爸去哪儿》这个节目很火，他针对普通家庭在亲子关系、孩子与大自然之间关系疏远的问题，开展了以亲子关系为核心内容的活动，一炮打响。之后又衍生出了儿童动手学习传统文化等项目，公司逐渐走上正轨，找到了发展方向。

需要说明的是，他的家庭经济困难，成立公司很久之后，才还清了学费。

今年，国家在创业方面出台了很多政策，促进大学生创业。然而，很多大学生未做任何准备，就找到学校索要资金支持，提出的理由是没钱无法创业。诚然，资金对初创企业非常重要，但绝非必要条件。

何时开始创业最好呢？创业开始的时间不重要，重要的是你在找到创业方向后，积累的经验是否足够。有目的的经验积累，可以是在社会上，也可以是在学校中。

有位毕业生曾经谈到，应该在想要创业的领域积累一段时间，最好是2到3年，但具体时间因人因行业而定，之后再开始创业。

创业前要做哪些准备呢？笔者个人建议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认清自己创业的起点，是从兴趣出发，还是从解决问题出发。如果是前者，就要有意识地培养兴趣，有了足够的兴趣，做起来才有动力，这种动力会支撑你一直走下去，为他人创造价值。如果是后者，就要学会发现问题，因为问题意味着机会。遇到问题不要慌，在发现问题的基础上去分析问题，设计解决方案，哪怕是自问自答也是很有帮助的。

第二，勇敢地去实践，去做些不以赚钱而以助人为目的的事情。任何创业项目，从最本质的目的看，都是服务于人的，因此，对人的了解，非常重要。况且，做事的过程也是了解社会、磨练心态、积累人脉的机会。

第三，真诚地去寻找合作伙伴。与他们磨合，可以用创业者模拟沙盘游戏来作为媒介，去加深彼此的了解。

对于高校和社会来说，应该区分大学生成功创业与创业教育成功之间的关系。遗憾的是，很多时候，两者是混为一谈的，这样对创业教育会产生不利影响。

创业是否成功，一般用创办的企业数量、所创办企业存活时间、规模、盈利情况、吸纳员工、获得投资等指标来衡量，这是很科学的。用这套指标来衡量社会的创业培训，也基本适用。然而，如果用这些指标来评价衡量大学的创业教育是否成功，很可能会适得其反。

大学的创业教育与社会的创业教育的区别是授课对象不同。大学创业教育的授课对象绝大部分是潜在创业者，并非是创业者。而社会的创业教育，面对的多是创业者或有意愿开始创业的人。

对潜在创业者而言，创业教育的目的应该是培养其创业基因。所谓创业基因，是用来形容大学创业教育应该得到的成果。这种成果应该是内隐而非外显的，需要一定的时间去发展。在职业生涯过程中，它或许会使个体在职业中表现出创业意识，或许会使个体直接创业，而并非仅表现为在大学中创立公司。所用的方法，应该是激发和维持大学生的兴趣，鼓励他们在安全的情况下去进行实践，掌握创新创业的方法。作为学校和社会，不应用创业成功率来要求创业教育者。对于学生，不应因项目的不成功而否定人的能力与价值，应考察学生在学习过程中的努力程度，给予写实性评价；要对课程过程进行记录、分析，发现规律，凸显行动的价值。具体的指标可以是：发现真问题的数量；挖掘出价值的数量；将价值构建为商业模式的数量及质量；开发出产品（或服务）原型的数量及质量；产品（或服务）原型的用户数；产品（或服务）原型的用户数增长比例，等等。

教育问题谈

『仁』与『礼』之间

□ 力行

儒家对尊卑贵贱等级原则的强调是以礼为主导，但只讲等级之分容易导致严重的对立，这样反而会从根本上动摇等级制度的基础。于是《礼记》的礼治主义学说又提出了“仁”来作为增强社会向心力的有效手段。

“仁”这个词出现时代较晚。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中心范畴，“仁”是由孔子构造出来的。经过孔子的阐述，仁与礼之间形成了一种相辅相成的表里关系。这就是孔子所说的：“人而不仁，如礼何？”可见一个人在道德实践过程中时时刻刻要注意仁与礼之间的平衡，做到践礼以培养仁德，让仁德在礼中呈现。用于政治，则主要体现为一种以“亲民”“惠民”“利民”“恤民”为内容的仁政思想。《礼记》对这种仁政思想作了多方面的阐述。

首先，《礼记》中仁政的理论基础是民本思想。众所周知，民本思想堪称儒家政治学说的精华。这种精华在《礼记》中得到了充分体现。在先秦儒家看来，民众既是政治实施的对象，同时又是构成政权存在的社会基础。民心向背决定着政权能否持久稳固。民本意识往往体现在对君民关系的认识上。《礼记》作者也正是从君民关系的论说中阐发仁政主张的。《礼记·哀公问》：“政者正也，君为正，则百姓从政矣；君子所为，百姓之所从也；君所不为，百姓何从？”这是强调君主的言行直接影响民众，故君主必须谨其所言，慎其所行，以成为天下百姓的楷模。《礼记·缁衣》对此讲得更为明白：“民以君为心，君以民为体，心庄则体舒，心肃则容敬。心好之，身必安之；君好之，民必欲之。心以体全，亦以体伤；君以民存，亦以民亡。”这种观点与荀子提出的“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的见解可谓同出一辙，十分典型地反映了儒家重视民众的民本思想。

其次，“惠民”“利民”“恤民”构成了《礼记》仁政思想的主要内容。由于认识到了“君以民存，亦以民亡”的道理，所以《礼记》作者把如何争取民心视为政治成败的关键。对大部分民众而言，最难以承受的莫过于统治者在经济生活方面的横征暴敛、奢侈浪费和劳民伤财。《礼记·檀弓》对此有一段十分形象的描述：孔子过泰山侧，有妇人哭于墓者而哀。夫子式而听之，使子路问之曰：“子之哭也，壹似重有忧者？”而曰：“然。昔者吾舅死于虎，吾夫又死焉，今吾子又死焉。”夫子曰：“何为不去也？”曰：“无苛政。”夫子曰：“小子识之，苛政猛于虎也！”在这里，作者借孔子之口，以“苛政猛于虎”的比喻，告诫统治者决不能横征暴敛，否则必将丧失民心。正是基于这一看法，《礼记》提出了一系列“惠民”“利民”“恤民”的仁政措施。《礼记》作者之所以把仁政作为其礼治主义学说的重要内容，这是因为他们已经认识到“礼”所强调的是特殊性，目的是明确个体间的差别。“仁”则是通过一种互相恩赐的方式，设法在各个特殊的个体之间求得协调和平衡，即达到一种“和”的境界。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和”的境界正是儒家礼治主义者孜孜以求的政治理想。《论语·学而》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就是这种理想的恰当表述。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儒家所推崇的理想政治模式尧舜之治，实际上就是一种仁、礼平衡的社会政治状态。《礼记·表记》曾借孔子之口对这种理想政治大加赞赏说：“后世虽有作者，虞帝弗可及也已矣！君天下，生无私，死不厚其子，子民如父母，有恻怛之爱，有忠利之教，亲而尊，安而敬，威而爱，富而有礼，惠而能散；其君子尊仁畏义，耻费轻实，忠而不犯，义而顺，文而静，宽而有辨……非虞帝，其孰能如此乎？”

文化视野

（上接1版）

要重精准。只有对贫困妇女真实情况心中有数，做到底数清、问题清、对策清、责任清、任务清，扶贫脱贫才能真正做到精准到位。妇联组织要精准地分析和研究贫困妇女的致贫原因、帮助贫困妇女脱贫的具体路径，区分缺资金、缺产业、缺技能、缺项目、缺劳力等发展瓶颈以及因灾、因病、因学、因环境恶劣等不同情况，有针对性地提供扶持和帮助，确保真正帮到点上、扶到根上。

要强基础。农村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定》专门对发挥包括妇联在内的基层群团组织作用提出了明确要求。要进一步加强贫困地区乡镇和村级妇联组织建设，推动选好一把手，配强领导班子，把基层更多女能人、女带头人、女热心人吸纳进来，壮大联系服务贫困妇女的力量。要建好、用好“妇女之家”，充分发挥“妇女之家”的政治引领、宣传引导、扶持服务等功能，使之成为基层妇联组织与贫困妇女群众之间稳定便捷的“连心桥”。要为村级妇联组织提供必要的工作条件和经费支持，使妇联扶贫工作更可持续、更有成效。

要抓落实。实施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确保不漏一户、不落一人，最重要的是要让工作落地、把工作做实。妇联组织要把“三严三实”专题教育成效转化为实施“巾帼脱贫行动”的强大动力，把严的要求、实的作风贯穿始终，不喊不切实际的口号，不做虚头巴脑的表面文章，一步一个脚印把“巾帼脱贫行动”涉及的七项重点工作抓好抓实，做一项、成一项、见实效，让贫困妇女真正得实惠、普受惠、长受惠，不折不扣完成好党中央赋予的重大政治任务。

中华“和”文化一印一书法系列作品



龙凤和

作者：李铁



作者：阿朗一笔